

## 第 1 章 平安降落

一九九九年六月十七日 万里无云 蓝天如洗 绿野山川生机盎然。出游的人特别是乘飞机出远门的人，摊上这样的晴好天气，禁不住喜出望外。我和夫人也格外高兴；这是我们任满回国的日子。我俩告别了来伦敦国际机场送行的朋友，兴冲冲地登上中国民航飞往北京的波音 747 - 400 豪华客机。

我们刚在座位上喝完一杯饮料，747 就平稳地起飞了。那隆隆的发动机声像在提醒我：驻曼彻斯特总领事的使命已经结束。

人说“无官一身轻”。我算是尝到了个中滋味。此时的“满身轻松”实在难以言表。这多半因为肩上责任的解除，也由于突然放下了此前正在进行的多项工作。就说接到回国调令这一个月吧，忙活得人几乎招架不住。首先，美国轰炸我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的野蛮行径，不仅燃起中华大地的怒火，也使居住国外的华人激愤万分。这种形势下，总领事馆怎样支持、保护他们的爱国行动，如何就此接受记者采访，怎样应邀去 BBC 电台当场回答问题？急需仔细地研究思考，以避免出现差错。第二，建国五十周年大庆准备工作已经启动，要向出席庆典的众多嘉宾及早发出邀请，选定庆祝

大会举办地点也很重要：是在新落成的英国西北地区最大的华人餐厅，还是借用曼彻斯特理工大学剧院式礼堂？这要从会场的气派、宴会和文艺演出是否便于操作以及来宾停车方便等方面周密地考虑和定夺。否则，四五百人的庆祝活动出纰漏就不好了。还有，由华人子弟学校西乐队演奏的中英两国国歌及华人社团准备上演的主要文艺节目，也需要审定和指导。第三，召开侨领会议，查清台湾分裂势力自苏格兰向曼彻斯特领区渗透的情况，对其“银弹外交”扩充“活动空间”的阴谋要加以揭穿和防范。第四，写好《离任报告》。这得靠下班以后的挑灯夜战……

为保证完成上述工作安排和尽量避免当地华人为我夫妇饯行，我决定，总领事任满回国一事保密，限在馆党委成员范围公开。因此，我不动声色地工作，工作，再工作，直到向当地社会发出离任招待会请帖，人们才知道我即将离任。“暂时保密”的做法，为我争取了时间，尤其挤出写《离任报告》的时间。

《离任报告》中最后写到的日期，与我回国的时间相同。实际上，也真的到我离开总领事馆大门去机场那一刹那，公事才告结束。

“王总，王总，您的接任人今天被英方接受。这是使馆才来的电话……”一名干部匆匆跑下办公楼，拦住刚启动的送我夫妇去机场的汽车，报告道。

“好，新总领事很快就来馆了，望大家团结工作，取得更大成绩！”我激情地说。我夫妇打开车窗，向大家再次挥手致意。

同事们握别的话语还在耳边，747客机已升至万米晴空。它在灿烂阳光的照射下，直奔祖国北京，傲然飞翔。机舱里静谧温馨，平稳得就像坐在自己家里。这是目前世界上最大、最舒适的客机，安全系数也高。

我对747有着与众不同的感情。当外交信使时常坐它“周游

列国”那时我的体重一百公斤 在中国信使中个头儿最大 于是，同行把我与 747 连起来 起绰号称呼我“747”。我欣然接受了这一称谓。外国人称呼 747 的英文发音多为“江保”。所以，也有人这样称呼我。对哪样的称呼，我都不以为然，因为反正是一个意思。

747 一九六五年问世 很快占领大型客机市场 载誉全球。747 - 400 型是 747 家族最大的，拥有四百多座位，至今仍属最大的机型。媒体报道，波音公司拟耗资四十亿美元研制的 747 - X 型 将载客五百人，机舱座椅间距也加宽许多，乘坐起来会令人更为舒心。离任回国之际喜乘 747 好像故友重逢 再次享受到它的豪华服务。

在头等舱中间的梯形台子上，整齐地摆着中外的白酒、葡萄酒 还有可乐、橙汁、番茄汁、矿泉水 也有冰块儿、咖啡、小吃……各种饮料食品免费提供 旅客自选。还有报纸、杂志、扑克牌、小儿玩具等随时可以阅读、使用。

我解开安全带，起身脱了上衣。一位年轻漂亮的小姐马上接过我的衣服 熟练地开启衣橱 挂上衣架。当我在柔软的沙发靠椅上坐下时，另一位小姐笑着递过来湿毛巾。打开那洁白的毛巾卷儿，一缕馨香猝然扑鼻。人们都意识到 晚餐即将开始。从伦敦至北京 空中飞行十个半小时。旅客在万米高空吃两顿饭 看两个电影 休息 至次日中午前抵达。

我有这样的体会 在地球上由东向西飞行 如从美国、加拿大经日本飞北京 感觉很累 吃不好 睡不好 时差也不易倒过来。要是从西向东飞行 则省时省力 不觉得怎么累。有人说这是因为地球自转因素在起作用。我从伦敦、巴黎、莫斯科、亚的斯亚贝巴等地多次飞往北京 都有轻松、快的感觉。这次从伦敦飞往北京 属于由西往东飞 加之精神上放松 简直没有累的感觉。飞机上 我竟一夜没有睡觉。

我不仅未曾睡觉 也没看电影 更没有阅读报纸杂志或与他人聊天。难道，只用吃喝打发了这许多时辰吗？不，那怎样可能呢，即使头等舱用餐拖得时间长，有两个小时也够了。那八九个钟点如何度过呢？

我躺在座椅上 长思冥想 回忆了几十年自己走过的路。

我从孩提时代忆起。首先想到生我养我的双亲。他们虽早已过世 但是他们的音容笑貌记忆犹新。接着 我想起小学时对自己影响深远的三位老师。如果没有他们苦心栽培，我不可能考上北京市重点中学——顺义牛栏山中学。那是一九五三年，平均二十名小学考生录取一名 先要在草榜上有名 经过面试正榜上有名才算真的录取。我如愿以偿了。现在，三位恩师已有两位故去多年，其中一位还在一九五七年受了不应有的冲击……想起这事，我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儿。之后，我回忆了上大学和报考研究生的情景，再想下去就是毕业以后进外交部的事了。

进外交部以后的事想得最多，也最清晰。那些接触过的人和事像过电影似的，一幕一幕地展现在眼前。如 我初进外交部时遇事如何幼稚、易冲动 以及那“踌躇满志”的样子 后来工作中怎样有机会见乔冠华；怎样因延误办案使司领导和乔冠华受周总理批评；最后想了去西藏和在英国三年多的工作——这中间为迎接香港回归花的时间和精力最多。回忆当时怎样深入英国主流社会宣讲“一国两制”、“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的方针政策 在利物浦会见当时香港行政长官人选之一的陈方安生女士 以及如何就“香港临时立法会”一事与她展开争辩 再有 就是在曼彻斯特辖区内与达赖集团和台湾分裂势力所进行的周旋和斗争。我越想越激动，不仅没有一点睡意，就连眼前银幕上正在放映的电影也没顾上看。

民航小姐的服务态度有显著改进。尤其国际航班的乘务员，不仅待人热情 工作也越来越规范化 即使在旅客睡眠时间也有人

在机舱里巡视。

“您——想喝点什么吗？”显然她早已发现我没有休息。

“好，来一杯加冰的矿泉水。”

一杯水下肚以后，我的回忆再次恢复，一连想起好多同龄人的情况。有些是很要好的同学，其中有一名是小学同学，至今保持着联系。我上过两所大学，先是外贸学院（今经贸大学），本科毕业后入外交学院做研究生（一九六五年改称调研班），所以我的大学同学分布在外交、外贸两个系统，我还有三年编制在外交部，人却在西藏外事办公室任副主任的经历，以至在省市外办开会和交流工作中结识了不少在地方工作的朋友。我的同学、同志、朋友多与“外”字有这样那样的联系。想到这儿，我心里产生一种莫名其妙的自豪感，说不定脸上已显出几丝微笑。但一下子马上意识到这种心情很是欠妥。因为，虽说外交在国家机关班列第一，沾“外”字的工作相当重要，但是，时刻不能忘记“外”字的坚强后盾是中央领导、整个国家，是各行各业父老乡亲 and 兄弟姐妹。弱国无外交。有强大祖国和人民的全力支持，外事工作者才能引以为自豪，才能经过艰苦奋斗获得成绩和有发展前途。

那么，在所熟悉的同龄人中哪几个进步最快呢？显然不包括自己。要是把任省部级干部的人列为“上游”，自己可以排个“中游”。而且，这个“中游”在一定程度上还与机遇和工作需要有关系。让我欣慰的是，在那“上游”行列中有我熟悉的人，有的是早年由我介绍入团，有的是由我介绍入党……想着，想着，我又有点悠然自得了。我赶忙打住这种联想。后来又觉得，这也是人之常情。总不能说不，没有这样的同学比有倒好。人说，机遇决定一切。然而，机遇只对自强不息的人才起作用。否则，再好再难得的机遇也要擦肩而过或得而复失。有同学进入“上游”行列，那是他们自身努力上进的结果。我为有这样的同学而高兴、自豪。

接着我又想到自己工作年龄过线、任职超期，应该无复他求。离开现职岗位退休，比较合适。进入这一群体过全新的生活吧。外交官生涯结束不是人生的结束，需要走的路还远哩，得干点儿事才行。

干什么呢？有“返聘”一说，然而那是对身体状况好、且工作需要的同志而言。这两个条件我不怎么具备。可是，不管怎么说，总要面对“忙人”向“闲人”的转变。据说这也不容易。有朋友曾为我出主意：“把第三代接到身边，让孩子闹腾一年半载的就能适应退休生活了。”对此说法，我未置可否，觉得自己不会有那么大的“不适应”。退休，无非是运用退出岗位后产生的可支配时间，以休憩方式寻求新的生活和乐趣，也属“服从组织分配”的一部分，需要国家、社会、法制乃至道德观念等方面的保护与支持。退休时光过得好，也会产生社会效益。这凭借退休者进取精神、坚强毅力和健康体质而获得。

应该怎样安排自己退休后的日子呢？我忽地想起赴任总领事之前，唐家璇同志谈话中的临别赠言“老兵新传”四个字。部长赠言仍然没有过时。根据我的具体情况，我得在休憩之余，完成一本书的翻译，再自己写一本。“呀，这不成了‘两本书主义’吗！”我心里暗笑。翻译那本书的工程不太大了，因为十几年前已经有个初稿，只需拾起来从头至尾理一遍，打印清楚就行了。这写一本可是写什么呢？自己肚里的墨水够用吗？试一试，这或许是一种乐趣，拿它打发日子不是很好吗？

写多年来走过的路吧，写自己的亲历，包括所看到、听到的人和事，以及自己认为有益的感受。这把年纪只有写自己熟悉的事物，才有写成的一线希望。

“各位旅客，本架飞机即将降落北京首都机场……请您系好安全带。”

空姐清脆的广播声打断我的思绪。我透过舷窗向外望，见747-400已飞越燕山到了北京东北郊顺义上空。骄阳如火，大地正值麦收。一片片金黄的麦浪被无边绿色围得严严实实。前方不很远，是首都机场那长长的跑道。它像展现在绿色海面的超长巨轮，心想那要是一艘真实巨大的航空母舰就好了！那样，747可以降落在海上。

沙——飞机着陆。

“好——”“OK——”

伴随747平稳地降落在跑道，机舱里爆发出长时间热烈的掌声、欢呼声，还有外国朋友的口哨声。这是全体旅客对机长娴熟驾驶技术的褒奖，也是对全体机组人员的谢意。

“江保”客机稳稳地滑行着，我平安地降落在故乡土地上。

地处北京顺义区天竺的首都机场，距离生我养我的小村庄很近，不足十公里的路程。一九五八年，我这个正在高中学习的农家子弟，曾在暑假期间由老师带着，背着铺盖卷儿到首都机场扩建工地勤工俭学。那时候，可没有想到坐飞机，更没有想过坐这么好的飞机。当然，那时故乡也没有建设得像今天这样美。

## 第2章 牛田洋——外交官的特殊熔炉

### 1. 一个报告引起的

北京市顺义与昌平交界的温榆河畔，有个叫南王路的自然村。一九三八年 我出生在那村的一间长工屋。十岁那年家乡解放 我在新中国朝阳照耀下 相继走进村小学、牛栏山中学、北京外贸学院（今经贸大学）应试北大研究生招考未及第 在高教部和外交部一纸通知之下 进了外交学院，一九六六年研究生毕业分到外交系统。

在那个特殊年代，不论谁，出学校门进机关门都没有工作做。这也难怪 连外交部的“乔老爷”都到“王府井卖小报”了，一般人还能有事干吗“能避开”“打内战”、不卷入无休止的漩涡已经不容易了。

“文化大革命”进行两年 没有结束迹象。包括外语院校在内的全国大专院校都没有复课希望 更别说招入新生。于是 外交部结合本部门需要，预感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向周恩来总理报告，

说国家今后几年之内将没有外语院校毕业生 为外交事业计 急需把一九六六届毕业的部分学生集中管理、进行培训。报告引起重视 有关方面开始落实和经办。显然 当时进行这项工作最合适的地方是解放军“大学校”那里一般不搞运动。

一九六八年六月十五日 中央下达《关于分配一部分大专院校毕业生到解放军农场去锻炼的通知》。八月 外交部凡属一九六六届毕业的大学本科生、留学生、研究生，一律下放牛田洋解放军生产基地。



1970年2月 0489部队政治部部分牛田洋战士合影，前面左五为政治部负责人朱毅鼎 作者为左四

牛田洋位于广东汕头的韩江入海口。一九六二年九月起，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根据中央关于调整国民经济的部署，派部队在韩江口筑堤 围垦牛田洋海滩 开发农业生产基地。一九六三

年一至四月 四十一军一二二师经过四个月苦战 筑海堤三十四华里 造田八点六七平方公里 当年围垦当年插秧 平均亩产稻谷一千多斤。牛田洋基地大海夺粮的喜讯传到北京，毛泽东主席非常高兴。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老人家在关于牛田洋的典型报告上批示：“人民解放军应该是个大学校……”这就是后来家喻户晓在全国范围产生热烈反响的“五·七”指示。那之后陆续建立的干部劳动场所 称做“五·七干校”。后来，“干校”遍地开花。

外交部到牛田洋锻炼的人共一百八十三名，我是其中一个。大家听说是根据毛主席和周总理指示办事 都兴高采烈 百分之百地拥护 很快搭京广线特快列车启程。人人精神抖擞 个个心花怒放。在火车包厢显身手，行程万里歌万里。那革命歌曲和样板戏的演唱 高昂嘹亮 此起彼伏 即使用餐时间也不曾停止。青春的交响 压下车轮撞击铁轨的轰鸣。什么恩怨呀 派性呀 极左呀 这些“文革”洒在青年身上的污物 似乎被欢乐的海洋之水荡涤干净。当一响长长的笛声过后 车轮咯噔地停住 这才发现已经到了广州火车站。

牛田洋生产基地派的车队已经在车站等候。我们鱼贯而行，兴致勃勃地登上清一色解放牌卡车。

那时候，从广州到汕头行车需四小时。山道弯弯，热浪滚滚。人们脸上、身上充满湿乎乎的汗水。“解放牌”颠簸着行进 比京广线的火车慢多了。大家有时就公路两旁的山丘景色议论几句，似乎谁都不想唱歌了，有人眼皮已经开始打架 想睡一觉。所有的人都累了。司机有时停下车 拿着毛巾走近路旁水沟 蹲下身子 狠命地搓几把脸。他们提提精神以后 又回到驾驶室 继续行进。

牛田洋终于到了。“解放牌”一直把我们送到营区。

营房的支架用毛竹搭成，封着竹席，房顶盖的是厚厚的稻草。这种房子防震性能很好 挡风遮雨也行。它作为临时住处 生活一

段时间是可以的 若谈“扎根边疆”将来拉家带口地住下来 恐怕不够条件。

生产基地由东牛田洋、南牛田洋和西牛田洋组成。分别由四十一军一二二师的五团、六团、七团、炮团驻扎管理。据说 四十一军还有别的部队，在牛田洋以外执行任务。外交部的男学员分成三个连 编号是“学一连”、“学二连”、“学三连”。这三个连队分别派进野战部队五团第一营、六团第一营、七团第一营。外交部的女学员没有被编成“学四连”，而是突出一个“女”字 编号是“女子连”。由于条件艰苦 学员中的几对夫妻被暂时分开 平时无机会见面了。部队对“女子连”特殊照顾 将这一连安排在炮团。炮团由师部直属 驻在离大海较远的地方 生活条件也好些 平时没有多少农活儿。

我们学英语、俄语、西班牙语 的男性被分在“学一连” 驻东牛田洋 各方面条件适中。学法语的男性被分在“学三连” 在西牛田洋 条件差多了 那是新围垦的土地。学小国语言如马来语、印地语、尼泊尔语的 以及晚来部队报到的人 多数编在“学二连” 在南牛田洋 那里的条件最好。

“学一连”不是清一色外交部的人 还包括来自中联部的外语干部。他们主要插在“学一连”三排七、八、九班。后来 听说又组建了其他“学生连” 开始一段时间来的人是学外语的 以后学中文、学历史、学理工的都有了。因为中央下达的文件是“关于分配一部分大专院校毕业生 到解放军农场锻炼 只要是大专院校毕业生 不论学什么、属于哪一届的 都可以来。牛田洋军垦农场执行中央指示 来者不拒。最后 学员总数达二千一百八十三名。

按规定，一个“学生连”的连长副连长、指导员副指导员、三位排长，至少七个干部从部队调任，学生自己只担任副排长以下职务。我当过副班长。我们连长宋勇军同志是个好带头人 然而 在

对这么多知识分子的“再教育”中，也不是得心应手。大家最不满意的是他没能保证每天的外语学习。周总理明确指示，保证每天安排一定时间学习外语。但连里就是不予重视。除了种稻子，还是种稻子，除了挖海泥，还是挖海泥，除了挑担子，还是挑担子……一天过后腰酸腿疼，谁还有精力打开书本学外文呢？学员为不能落实周总理指示干着急。后来意识到，这责任不在宋连长，他哪里有这么大权力。大家只好“服从命令听指挥”，在雨天不能出工时抓紧复习外语。共同的心愿是：不辜负总理和外交部领导的初衷。

使用外语的机会几乎等于零。全连只有李肇星等两三个外语基础好的人，有时被借到广州参加接待外宾的工作，算是没有完全离开本行。然而，几天后还得回连队劳动。当时，李肇星是我连炊事班长，每天起早贪黑地干活儿。清晨，他提着箩筐去地里割空心菜，饭后又背着篓子到池塘打猪草。那黑脸膛儿上的汗珠儿很少干过。炊事班任务很重，一方面要保证人吃得饱吃得好，一方面还要保证猪养得大而多。

其余人每天都是干农活。我最发怵的是挑担子。挑担不用扁担而是用竹杠，有时是用锄把子。用这种物件挑担子没有颤悠感，死死地压在肩上，很难承受。我以前因为挑担少，只会用右肩挑，左肩不能吃劲儿。在牛田洋稻田挑一趟肥水要走二三里路，一个肩膀怎能挑得了呢？我只好有意识地练习左肩。说说容易，真练起来像是要把人疼死。有几次，我疼得摔倒在水田里，人粪尿洒到身上……我终于坚持下来。经过一次“双抢”（抢收早稻和抢插晚稻）的锻炼，我的脖颈子压出一个茶碗似的肉疙瘩，左右肩膀都可以挑东西了。对那与扁担完全不同的圆竹杠，不再望而生畏。

牛田洋冬季不种稻子，但要开挖或修整水渠。冬闲实际是在冬忙。人们天天忙着与海泥打交道。海滩地不是黄土而是黑泥，一锹挖下去就出水，开渠不能用铁锹，要靠人的两只手伸进水里。

挖。打油诗描述挖泥人形象是：“上身穿棉袄，下身打赤脚，每天都负伤，不治也能好。”前两句意思明显，后两句是说，海泥里贝壳多且锋利，干活儿过程中手脚弄伤流血是常事。但不必害怕，因海水里有盐分，不会感染，无需治疗。因此，牛田洋人经常是老伤口刚好，又出新伤。这当然指的是小伤口，大伤时也得去医院。我记得一九六八年冬，中联部一位同志脚板被贝壳伤得厉害，抬到医院缝好几针，很长时间才康复。

由于生产劳动中成绩突出，“学一连”不少人受到嘉奖。如学英语的肖华山、许军等多次受奖。学西班牙语的王成家、张沙鹰、许昌才、翁景升等，不仅田间劳动不怕苦和累，还积极地编演文艺节目，鼓舞大家斗志，活跃连队生活。学西班牙语的同志多属于“小字辈”。别看年龄小、学历浅、工资低，他们的思想觉悟可不比别人差。论在牛田洋生产基地的贡献，他们比我们大。这些人来自江苏、上海，种稻子十分内行，插秧、田管、收割、晾晒，样样精通。

在东牛田洋广阔的稻田里，有一条横贯东西、高出田面的水泥晒场，很宽，很平展。那上面，除了部队各连的营房分别一字排开，还有几个篮球场、操场和养殖地。稻田的百分之八十在这大晒场和第一道海堤，堤外边是海，之间。其余稻田则在大晒场和第二道海堤，以前老百姓筑的拦海堤，之间。这稻的海洋当中，还有一条与海岸垂直走向、不宽、比大堤稍矮的土堤，它横穿第一、二道海堤和大晒场，称做“小横堤”。人们上工或下工都愿走在它的上面。北面山脚几个小村的渔民下海和孩子到海滩捡牡蛎，往返走的也是“小横堤”。时间长了，它表面虽说不是水泥的，但是又硬、又平。“小横堤”和第一道海堤交接的“丁”字形地方很宽敞，几十人可以坐在上面休息。听人说，以此为界，便是东、西牛田洋的划分。站在“丁”字口，无论向左望，还是往右望，拦海大堤都像一条龙似的伸

延，影影绰绰看不到尽头。听老牛田洋战士说，建造牛田洋大堤动用的土石方如果以一立方米为单位排列，自北京能够排至武汉（一千三百零三公里），它是军民的血和汗建立起来的，是“五·七”指示的丰碑，是生产基地的保障和牛田洋人的生命线。

## 2. 一条耸人听闻的消息

一九六九年上半年，驻守牛田洋生产基地的四十一军调离，由五十五军接替。但是，生产基地干部和在“学生连”担任教育管理工作的部队人员基本没动。“学一连”的变化只是营地北移，贴在了第二道堤的外侧，离基地指挥部近在咫尺了。

堤内侧有一个白墙围着的院子，院里有几栋水泥建造的平房。这就是基地指挥部。指挥部里常见的领导人是一位高高个子、体魄很魁梧的职业军人，人们亲切地称呼他白副师长。这个四十岁出头的北方汉子，常穿一身褪了色的军装，有时一个人在二道堤上走走，见着人时点点头。这是他在忙里偷闲儿。

一九六九年七月二十七日这天，白师长可不那么轻松，因为天气预报说：太平洋第三号强台风将于七月二十八日午后在广东省东部登陆。最大风力有十二级……

白师长一班人召开紧急会议。与会者有的在汕头地区驻守十多年，经历过台风，只是很少见过十二级台风登陆，心里没底。新接防的五十五军同志因为来这里不久，皆少说多听，或默默无言。会开得很吃力，主要在是否“撤退”问题上难出定见。“撤”人员、军械、器材都可以保证不出大的损失，时间也来得及。但决心太难下，因为“撤”意味着放弃任何防守。这怎么对得起毛主席“五·七”指示？不撤吧，风险很大。白师长惦念着正在田里劳作的一万多军人和学生，他额头的汗水已经流下来。“集体力量”发挥作用，

终于有了决策 捍卫‘五·七’指示 誓死守护大堤 人在大堤在。

一九六九年七月二十八日 台风真的来了 而且提前近四个小时登陆。预报十二级台风的风速是每秒三十二点七米。七月二十八日的台风竟超过了这一预报。它来势凶猛，延续时间长，与暴雨、海潮同时为孽 因此人力不可抗御 也由于通讯信号受风雨等因素干扰 有的部队没收到相关指令，一味按‘人在大堤在’行事，造成了无谓牺牲。决策失误和人力不可抗御的天灾，使牛田洋遭遇了世人难以想象的劫难。

事发当晚 广州军区派员赶赴牛田洋组织救援。第二天 周恩来总理和中央军委电示军区处理好善后。紧接着，外交部副部长徐以新率领慰问团到牛田洋慰问。

在中央首长关怀之下 部队很快稳定了情绪 并满怀信心地开始抗灾和总结经验教训。可是就在这个时候，有国际媒体别有用心地放出消息，幸灾乐祸地宣扬，说周恩来储备在牛田洋部队农场、打算派往联合国的大批外交干部 在广东汕头的台风海潮中丧生……

这纯粹是欺骗世界舆论，是彻头彻尾的编造。

我是当时了解具体情况的人之一。我不仅在台风海潮发作时奉命冲上拦海大堤 参加了第一线战斗 也是事后参与了解全面抗灾抢险情况、采写有关先进事迹的人。我可以坦言 外交部派到牛田洋的一百八十三人 只有留学英国的肖华山、学俄语的陆海林等少数几个人不幸遇难。绝大多数不仅没有丧生，反倒经过那次台风海潮的洗礼 献身外交事业的意志更坚强了。不怕苦不怕死、不图名不为利的牛田洋精神 鼓舞了一代外交官的成长、壮大。正是这一批人 牢记周总理的教导 接过老一辈外交家的班 继续给党和国家的外交事业添光彩，很多人被委以重任。

以“学一连”为例 有的当了部长、副部长 有的派驻国外 担任

大使、总领事、参赞或其他外交官如 驻美国大使、驻英国大使、驻日本大使、驻联合国大使 都曾有牛田洋‘学一连’的人在任职。在同一国家的同一时期，还有过两个以上的牛田洋人在那里常驻。如在英国 大使马振岗、政务参赞孙本志 加上我 都是牛田洋遇险存生的人。一次 马大使到访曼彻斯特 我们曾打趣地说 三十年前大家一起种稻子、一起奔赴拦海大堤抗风抢险、一起给报社写稿子 如今在英国又碰到一起了。这缘分可是不浅 我还说：“那时你是领导（副排长），我在你领导之下。现在你是大使，还是领导……”牛田洋战士在异国他乡见面 那心情、那兴奋是难以言表的。特别是回忆起当时经历的事，像昨天发生的一样清晰。

“文革”前 马振岗和在牛田洋牺牲的战友肖华山曾一起在英国留学，一起回国……他们的缘分更深。然而，当他肩负国家重任、故地重游的时候 在感情上多了一层凝重 战友未竟的事业理所当然地加在了他的身上。他惟有加倍努力工作，坚定担负起重任 报答祖国和人民的培养 才好安抚战友的在天之灵。

在外交第一线奋斗的牛田洋战士中 还有一位值得一提 那便是潘占林同志。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用导弹袭击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时 潘占林同志刚好在那里任中国大使。据说 就在导弹击中使馆的前几分钟 潘大使等还在地下室有活动 谁能料想大家刚刚散去 才回到自己房间休息时 钻地炸弹从空而降 击穿各层楼板 其中一枚在那间地下室爆炸 使馆陷入一片火海。骇人听闻的事件发生以后，潘占林马上冲到现场，不顾一切地与同志们一道，寻找遇难同志遗体 抢救负伤同志 转移国家重要财产和机密 并紧急向国内报告了情况。接着 他坚守岗位 开始一系列交涉和后续工作。潘占林曾是我们‘学一连’的一个战士 在关键时刻再次显示了牛田洋人不怕苦、不怕死的精神和连续作战的顽强作风 又一次经受了生死的考验。

我熟悉潘占林这个中国东北汉子。他处世沉着、刚毅 不善出头露面，可以讲一口流利的俄语。早年，他曾在莫斯科等地工作，默默地在外交战线的战线奉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因为牛田洋战友遭到袭击 也因为英国是‘ 北约 ’重要成员、美国的忠实帮手，当时在英国工作的我，心情十分激愤，怒不可遏。我利用一切对外场合，无情揭露了美国侵犯中国主权的滔天罪行，毅然应邀前往 BBC 广播电台播音室，接受采访并亲自宣读中国政府声明( 英文稿 ) 艰苦奋斗得到一定的回报 包括曼彻斯特政府主管外事的副政治领袖在内的英国主流社会人士，就此事件的发生给我写信 表明自己立场或口头向我表示遗憾和道歉 希望不要因此影响中英之间在香港回归后发展起来的良好关系。

牛田洋是一代外交官的特殊摇篮。经它那里风雨成长起来的中国高级外交官 实在不胜枚举 可以说遍布了全世界。据我在报纸上极不完全的统计 外交部部长李肇星、驻英国大使马振岗、驻日本大使陈健、驻古巴大使王成家、驻墨西哥大使张沙鹰、驻委内瑞拉大使王珍、驻乌拉圭大使霍淑珍、驻哥伦比亚大使刘峻岫、驻南斯拉夫大使潘占林、驻葡萄牙大使陆伯源、驻缅甸大使梁栋、驻叙利亚大使时延春、驻阿尔及利亚大使郑阿全、驻刚果 布 大使曲阜君、驻东帝汶大使邵关福 还有吴筱秋、陈棣、朱兆顺、赵希迪、许军等同志曾在前东欧几个国家或大洋洲国家任大使，甚或不止一次。以上大使都是外交部派到牛田洋劳动锻炼过的人。

学阿拉伯语的牛田洋人孙必干同志，在五六个中国驻外使馆工作过 付出极大的辛劳 曾经出任中国驻沙特阿拉伯、伊拉克、伊朗大使。伊拉克战争结束后 在那里形势未稳、爆炸不断和重建任务严峻的情况下 已经年过花甲、退休告老的他 听命国家调遣 穿起戎装 担负了中国驻伊拉克使馆复馆小组的一把手 又开始新的征程。牛田洋人为了世界和平进步事业，早把生死置之度外。